

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成果丛书

童兵 / 主编

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

最新报告 (2016)

 复旦大学出版社

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成果丛书

童兵 / 主编

谢晨静 王宇 唐荣堂 张晓锋 / 副主编

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 最新报告 (201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最新报告. 2016/童兵主编.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6. 11
(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成果丛书)
ISBN 978-7-309-12611-2

I. 中… II. 童… III. 新闻学-传播学-研究报告-中国-2016 IV. G21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54314 号

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最新报告(2016)

童 兵 主编

责任编辑/章永宏 朱安奇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90 × 1240 1/16 印张 30 字数 706 千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2611-2/G · 1656

定价: 6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言

《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最新报告(2016)》是自2006年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985基地)成立以来,编撰出版最新报告的第十一部。它的宗旨同过去的十部最新报告一样,是梳理和评介过去一年(2015)全国特别是中国高校新闻传播学科学研究的概况和成果,即该年度学者们(因难以甄别,部分研究生论文也会选入)发表的同新闻传播学相关的学术论文及主要观点,出版的相关著作、教材、译作以及会议论文汇编和各类统计类报告(俗称蓝皮书),国内外高校召开的新闻传播学学术会议,以向人们,特别是学界,鸟瞰式地展示过去一年中国(以大陆高校为主)新闻传播学研究全貌、代表性学术观点,以及研究者和编撰人员对它们的评价。

根据本部最新报告对2015年年度研究状况及成果的检索与梳理,2015年中国新闻传播学学术研究聚焦的热点议题和研究重点、特色大致是:

1. 新闻学基础研究的热点:在新技术发展和传媒业改革双重冲击下,学者们对新闻理念重构与创新的探索,提出了以网络传播为基础的“后新闻业时代”。
2. 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梳理与分析,成为新闻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又一个热点。
3. 传播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多维视野特色开始凸显,传播学与人文、自然许多学科的交叉研究得到深化。
4. 以舆论引导、舆论监督、民意、舆情、舆论场、舆论新格局等为话题的多角度、多层面的舆论学基础理论与实务研究受到高度关注,吸引了众多研究者和他们的研究投入。
5. 新媒体本体研究以及以新媒体为核心的媒介融合研究成为产业改革与产业发展的动力,研究的成果也大量涌现。
6. 2015年台湾地区的新闻传播学研究继续成为本研究报告的重要内容,使本报告成为大陆少见的兼顾两岸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大型综合性研究成果。

本部最新报告的撰写与编辑出版,主要由复旦大学新闻学院2015级全体博士研究生在研修我主持的新闻传播学前沿(I)课程的基础上,本着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原则,运用集体的力量完成的。还有几位博士后研究人员(有一人已出站)应邀参加撰稿。同过去一样,已经毕业的博士生、现在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执教的黄裕峰老师也送来了这一年台湾地区新闻传播学研究状况及成果的报告。担任南京师范大学人文社科研究院副院长的张晓锋教授应邀担任本报告的副主编,负责2015年年度全国新闻传播学学术会议和新闻传播学著作、教材、译著及各类汇编的梳理编撰工作。

在本部最新报告即将付梓的时候,作为主编,要向本部报告的全体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也向一如既往地支持编撰出版最新报告的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创

新基地的同仁、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复旦大学出版社诸位领导和朋友、张晓锋和黄裕峰两位先生,表示我的感激之情。

最后,同前十部最新报告付梓时一样,这部最新报告交给出版社的时候,我内心依旧忐忑不安。我国新闻传播学学术刊物和高校学报太多,每年发表的相关论文太多,涉及的作者又太多,尽管我一再嘱咐撰稿者对当年发表的相关论文要进行“地毯式检索”,仍难以避免疏漏少数学者的少数重要论文,对观点的归纳提炼也未必处处精当。如果出现此类情况,则应由我负主要责任,并向作者表示深深的歉意。

真诚期待广大读者,尤其是新闻传播学学科的学者专家对本部最新报告提出宝贵的批评和建议。

童 兵

2016年9月中秋佳节

目 录

前言	童 兵 1
----------	-------

第一部分 总 报 告

中国高校新闻传播学研究报告(2016)	2
---------------------------	---

第二部分 新 闻 学 研 究

新闻学基础理论研究	26
中外新闻传播史研究	41
新闻传播实务研究	69
舆论学理论与实务研究	93
突发事件新闻报道研究	115
新闻法规与职业道德研究	125
中国新闻教育研究	137

第三部分 传 播 学 研 究

传播学基础理论研究	154
受众与传播效果研究	173
公共传播与人际传播研究	189
全球传播与跨文化传播研究	210
艺术传播与时尚传播研究	231
健康传播研究	249
广告学理论与实务研究	271
公共关系研究	291

第四部分 视听传播与编辑出版研究

电视研究	304
广播研究	314
广播电视主持人研究	332

摄影研究	340
编辑出版理论与实务研究	349

第五部分 媒介发展与管理研究

新媒体理论与实务研究	366
媒介融合发展研究	408
媒介经营管理研究	424

第六部分 台湾新闻传播学研究

台湾地区新闻传播学研究	450
-------------------	-----

第一部分 总 报 告

中国高校新闻传播学研究报告(2016)

本书所报告的是中国高校新闻传播学在 2015 年年内所进行和完成的成果。检视 2015 年中国高校新闻传播学科学研究,其特点是:无论是新闻学还是传播学,抑或同新闻学和传播学相靠近的舆论学和媒介经营管理学,基础性研究都得到重视,并且成果丰硕;研究者的问题意识趋于明确与强化,新媒体普及条件下的传媒特点研究及媒介融合发展的前景研究得到加强;由于政府投入的增长和国际合作的深化,过去这一年,包括由中国高校主持的国际会议在内的各种学术研讨会盛况超过以往年份,撰写出版的学术著作、教材和译著数量也多于往年,再次展现中国文化教育的繁荣和学术研究的深入。

一、2015 年新闻传播学基础研究的深化

1. 新闻学理论研究

综观 2015 年中国高校新闻学基础理论研究文献可以发现,新技术的发展和传媒业的改革进一步冲击新闻传媒业,关于新闻理念的重构与创新在各个层面展开。一方面,在中国政治主导社会转型的国情下,新技术、新观念的普及与深入给新闻业带来诸多活动空间和可能条件;另一方面,技术进步和观念更新也给新闻业带来不小冲击,媒体焦虑,学界深思,政府压力加大。

以网络传播为基础的“后新闻业时代”开启后,现代新闻观念正在受到民众新闻观念的严峻挑战。有学者指出,民众新闻观念,即与民众新闻相应,就是从“个体出发”的新闻观念,它以“我知、我愿、我需、我趣”为新闻生产与传播的核心理念。现代性的相对统一的新闻观念已经被打破,具有一定后现代意味的多元化、多样化的新闻观念普遍流行;新闻正在民众新闻的浪潮中失去相对统一的价值标准,曾经被普遍接受的新闻价值要素学说正在消解为无要素观念。可以说,现代新闻观念已经遭到了民众新闻观念的强烈解构。

有学者详细分析了民众新闻观念的影响,主要有 5 个方面:第一,冲破了现代新闻观念对新闻的定义方式,新闻的外延不断扩展,新闻的内涵不断泛化。第二,动摇了现代化的新闻生产与传播观念,一个具有一定倾向性的共享新闻资源、共撰新闻文本、共绘新闻图景、共同新闻主体的“共时代”已经开启。第三,打破了专业新闻报道的核心理念与方法。第四,冲击了现代新闻主义的公共利益观念,所有当代民众个体的共在性,从根本上决定了所有人员都是相互关系中的存在、互联互通中的存在,因此,每个人的利益同他人利益、公共利益都是相关的,难以将不同利益一刀两断式地截然分开。第五,改变了现代新闻职业的新闻自由观念,原则的、理论层面的抽象性新闻自由,终于落在民众身上,接了地气。

有学者从中国政治主导的社会实践出发,认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这一政治理念及其在中国的实践,有利于催发和营造“对话新闻”理念普及的传播环境。对媒体而言,对话新闻的理念也带来一种自我解构和重构的可能。一贯将客观性原则奉为圭臬的媒体也应重新审视自我的角色,在守望社会的同时,更应具备一种呈现多元表达空间、推动社会进步的能动性。在这种背景下,2015年年初有学者提出重造新闻学之后,很快引起各方强烈反响。有人评价说,学人对这一话题的讨论有着各自的视野和出发点。有的从网络化关系视角切入,有的以新闻学发展现实推动力为话题,有的从新闻理论创新出发,有的则从新闻学研究的科学主义范式反思以及新闻符号学起始。尽管各人的出发点不同,但有一点似成共识,即新闻学研究要跟上全球沟通网络化的趋势,应从规范化研究转向经验型的理论剖析。也有学者对此持有不同的看法,认为当前新闻理论研究要抓紧的不是别的,而是努力提升理论教材的学理水平,关注新闻活动的最新发展,抓住基础理论研究这个关键,倡导多元化研究的方法论原则。

新闻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另一个重点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梳理和分析。在2015年,除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广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和代表性著作、观点进行挖掘之外,还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哲学基础、实践品格以及当前学习研究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这一年,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治传播观、邓小平改革开放时期的新闻观以及博古的新闻观点进行了专题研究。对于习近平的新闻思想,也有若干篇研究性专文发表。

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哲学基础主要有:事物的普遍联系、存在决定意识、对立统一、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人民历史主人地位,由此进而阐述相应的新闻观念,强调新闻传媒作为国家的思想上层建筑,有其现实的性质、功能以及历史使命。

有学者认为21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返本”研究式微,实践探索兴起,这直接导致学术创新的蓄力不足,同时也造成学科之间、学界内部关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的对话与交流不足。同时,同国内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学科相比,对外学术交流意识也不够。还有学者认为,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没有信仰。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明确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和意义何在。

新闻学基础理论研究还有一个重点是对于新闻规律的研究。在2015年,这方面的研究:一是围绕新闻活动参与者,主要是收受新闻信息双方的关系展开。有学者指出,研究最新发现收受主体的一体化开始在新的层面形成,传统新闻业时代的大众化新闻收受角色,正在发生大众化、公众化的传者角色转换,导致“生产—消费”融合角色的形成,从而至少在形式上实现了传受主体的新接近,也使新闻自由——新闻传收自由——进入了一种新的状态、新的境界。整体的社会主体之间可以在新闻领域中有效展开互动和共动,一种新的新闻共同体现象正在形成。这可以说是新闻传收目的律——传收主体接近化、一体化、平等化的时代性显现。

二是对新闻价值的重新审视。有学者指出,新闻价值定义之争实质上是定位之争。分析定义和定位之争背后那双看不见的手,探讨新闻价值影响因素的变革,是对第三媒介时代的新闻价值进行重新定位和定义。有学者提出,对新闻价值定义的新看法,即第三媒介时代的新闻价值融合了生活、工作、娱乐一体的价值导向,是一个以技术进步服务于人的信息需求,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动态过程。基于这一定义,该学者认为,第三媒介时代新闻价值要素的独特呈现是:第一,新闻传播无时不在,新

闻价值的“即时性”变为“全时性”。第二,新闻传播无处不在,更为重要的“接近性”升级为“定制性”。第三,新闻以人中心,新闻价值的“客观性”与“个性化”达到平衡。第四,新闻基于定位传播,“必要性”演化成为一种私人选择。第五,新闻要满足资讯、工作、娱乐需求,“沉浸性”成为新闻价值的内在基因。第六,传者受者合二为一,又分一为二,“合作性”成为新闻价值的核心呈现。

三是从一些新的角度对新闻生产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有学者认为,互联网深刻影响着中国新闻生产的变革,表现出生产主体从专业化到社会化、生产机构从封闭性到透明性、生产周期从周期性到循环性等变化趋势以及软性新闻主导的特点。新闻生产的主体除了网络用户之外,“脱媒主体”“职业爆料人”甚至是机器人记者的加入改变着新闻生产的生态。

有学者讨论了新闻生产中新闻从业者与用户权力的关系,认为记者同行之间的争议透明化被放大、群体抗议和失焦的民众异议,使得新闻传播的过程中增多了很多冲突的可能。正是这一原因使得记者成为饱受批评的人。他提倡新闻从业者与新闻使用者之间在新的情境下建立一种新的互动关系,需要对新闻使用者采取一种新的认知方式,从使用者自身出发,将其放置于历史的、日常的维度中,理解新闻使用者群体不断变化、流动,并与情境相互建构的特征。新闻使用者不是被动的群体,而是主动的意义生产者,是新闻生产中的对话者。为了新闻业的发展,新闻生产者应该致力于建构同新闻使用者的新型关系,并以一种新的方式重新理解新闻使用者。

还有学者提出,在新闻传播成为对话的今天,对话式新闻传播赋予新闻工作者“策展人”这样的新角色,要求其具有统筹全局、整合社会资源、动态调控的内容生产和传播能力。具体说,要求新闻工作者做到:第一,改变传统新闻观念。要充分认识到,在移动互联时代新闻传播已经不是职业新闻人的“专利”,只有对社会资源进行挖掘、整合和利用,建构全民参与传播的内容生产体系,才能改变新闻媒体被动应战的尴尬处境。第二,坚持公益精神。第三,注重专业知识积累和研究能力的养成。第四,增强对各类媒体及传播技术的深刻理解和综合运用能力。

有几位学者关注到新闻生产主体的多重性。他们指出,所谓“脱媒主体”,实质上是指那些非民众个体也非职业新闻传播组织的组织性、群众性新闻传播主体。这种主体对公共化新闻传播主体的结构变革、职业新闻传媒的生存法则、生产方式、传播原则、功能目标、传播价值等都产生着结构性的作用和影响。“脱媒主体”与民众个体主体的新闻生产和传播,在客观上起到了某种程度的解构或消解职业新闻组织主体新闻传播的作用,而非替代职业新闻传播的作用。与职业新闻主体相比,脱媒主体灵活性强的同时考虑公共利益也较少。

2. 传播学理论研究

新媒体变革性的冲击给传播学理论带来了挑战和发展机遇,如何将传播理论结合新媒体进行新的解读和发展是研究者共同关注的话题。在此基础上,5W模式、把关人、议程设置、使用与满足、沉默的螺旋、意见领袖、知识沟、框架等基础理论得到了深度阐释。

多维视野下的传播学基础理论研究。有学者指出,传播现象贯穿人类的整个历史与现象,各个学科都可以在自己学科的基础上研究传播现象和传播行为,并产生相应的研究成果。而传播学自身又是最具跨学科性质的学科,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哲学、语言学等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共同构成了它的学科背景和理论基础。在当今社会,任何一个单独的传播学学派都难以充分

阐释如此丰富和复杂的传播现象。因此,传播学不同学派的交融成为一种自然的趋势。在2015年的传播学研究中,国内的传播学学者继续这一良好的跨学科势头,在芝加哥学派、文化研究学派、法兰克福学派、政治经济学派、媒体环境学派、符号与话语研究等学派的多维研究视野下,产生了丰富而有意义的研究成果。

传播学与人文和自然学科交叉研究领域的深化。在2015年,传播学同人文及自然学科实行交叉学科研究,在政治传播、国际传播、城市传播、乡村传播、健康传播、科学传播、人际与群体传播等领域,研究视域拓展,成果日益丰硕。

政府作为传播的主体,尤其是在新媒体语境下的政治传播,在这一年受到不少学者关注。有学者针对新媒体环境下各级政府组织在传播方面发生的变化,提出政府在实行政治传播时需更新三个理念:尊重网络传播规律顺势而下,保持开放包容的传播心态,从传播技巧转向对线下治理的重视。有的学者重视政府领导人的宣传策略研究,他们以习近平宣传传播实践中讲究艺术和技巧为例,提出宣传艺术魅力的特色应该是:注重细节,善讲故事;崇尚简洁,倡导新风;善用俗语,朴实无华;巧用典故,彰显厚重;区分对象,讲求效果;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等。还有学者指出,在政治传播中,意识形态成功地变成一种“外在的”控制手段和工具,具有了多样化的外在形态,拥有了现实的存在特性——实在性,使之不仅成为社会现实的重要构成部分,而且发挥了强大的政治社会功能。还有学者指出,政治沟通与民主治理息息相关。推进政治沟通的现代化,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推动民主政治的进步,推动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所以中国应该用政治沟通来代替政治传播,强调其重要性,以及如何改善政府和公民的沟通。有的学者提出,要从政治学与传播学的“视界融合”的高度对政治传播进行新的界定和论证,认为政治传播是政治共同体的政治信息的扩散、接受、认同、内化等有机系统的运行过程,是政治共同体内与政治共同体间的政治信息的流通过程。因此,对政治传播的研究,应先研究政治宣传,后研究狭义的政治传播,再研究政治传播的新拓展。

在国际传播方面,2015年研究主要是紧扣国家传播能力、国家形象传播研究,并有了新的突破。这种突破,有学者指出,首先在由重视“我说”而开始进入重视“他信”的研究。其次是由重视国际传播“硬实力”到“软实力”的建构,当前特别要关注软实力这个中国国际传播的软肋,聚集“巧用力”的传播实践问题。在国家形象构建方面,有的学者考察了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理论、合作主义理论、建构主义理论和大众传播效果理论,以此为对照,认识现代中国社会多个领域形形色色的国家形象,并给予必要的反思。有学者提出以“源像”和“化像”为次级形象体系,以“硬形象”“软形象”“我象”和“他象”为再次级形象体系,呈现一个融整体观、动态平衡观、辩证观和建构观为一体的国家形象生态体系。

城市传播是近年来讨论热烈的一个话题。有学者回溯人类几千年的城市文明,聚合纷繁复杂的城市研究中不同维度的传播议题,建构以“传播”为核心视角的城市研究范式,并在此基础上,拓展传播学已有的相关传播与人之关系的论述,重构传播学的核心概念和理论框架。有学者运用量化方法测量91个文化符号对北京文化的代表性,发现北京文化符号中可归纳为京味文化符号、社会文化符号、政府文化符号、皇家文化符号等类型。还有学者认为新移民能否融入城市环境是城市传播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他们的研究发现,社交媒体使用只能在心理认同和弱关系的增加方面促进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融合,对于深度社会支持的获取和真实社会活动的参与则作用有限。同时又发现,如果人们

更多地使用社交媒体进行自我表达,其幸福感会增强;但如果人们更多地透过社交媒体来观察社会,其幸福感则会减弱。

健康传播研究是国内近年研究的一个热点,但2015年学界对健康传播的研究常流于现象描述,缺乏传播学理创新。有的学者研究角度新,有一定的拓展和成果。有的学者通过理论模型的阐述和实测模型的建构,认为健康传播研究要致力于理论指导下人的观念和行为的探索,致力于研究课题、方法和研究成果的创新,强调这类考察与探索应该是具体的、可观察和可测量的,其结论应该是考察事物间的重要关系(变量)而获得的。还有学者指出,作为健康传播过程中最重要的主体之一,传者往往位于传播链条的最前端,起着把关和引导的作用。现在剖析健康传播的症结,理应将传者放在首要地位予以重视并进行重点分析。

3. 舆论学理论与实务研究

舆论学是同新闻学、传播学走得很近的学科,也是20多年来研究者投入精力和经费最多的一个学科,舆论引导、舆论监督、民意、舆情、舆论场、舆论和舆论引导新格局构建等,成为每年同新闻学和传播学能够并列的热门学科。最近三年,更是形成将舆论学同新闻学放在一起研究的所谓“新闻舆论学”热点话题。

综观2015年中国舆论学理论、方法和实务研究,是在新媒体迅猛发展和中国社会深度转型的大背景下展开的:一是新媒体发展从传播技术和内容两个层面促使公众意见表达朝着多元而纷繁的局面发展。二是中国社会转型进入深水区,多元诉求引发社会矛盾激化和冲突不断,使得大众的讨论互动显得更加复杂多变。

舆论学基础研究。有学者在梳理公民社会从古至今的舆论演变基础上,研究现代公民社会舆论主体与舆论环境的变化,认为现代公民社会舆论传播呈现以下特点:公民跨越空间的交流形成巨型舆论场,不同公共领域的相互链接产生元主题公共领域,私人利益硬核化容易引发舆论的火山效应。这位学者认为,现代公共舆论具有制约公共权力、辅助公共决策、维护公民利益、进行社会预警等社会功能。还有一位学者归纳出中国古代舆论的十大定理,这些定理掣肘中国社会的律动,时至今日仍为社会治理的圭臬。与中国古代“谋划于口”的舆论相比,西方人近现代以来对舆论的讨论已经深入到学理层面,这位学者也总结整理出西方舆论学的十大定理,指出舆论是集群心、舆论的言论自由基础、公意的公正性、舆论领袖决定舆论流向、民意决定政府的合法性、民意政治就是民主政治等定理,奠定了议会政治的理论基础,支配着西方民众的政治理念和政治运作。

舆论生成机制研究。舆论生成机制研究在2015年主要涉及对舆论发生、发展演化过程的特征及其影响的考察。在新媒体和互联网技术环境下,随着社会结构和人们社会心理的变迁,网络舆论的建构和发展背景发生重大改变,网络舆论生成演化的新特征、新变化成为研究热点。

有学者讨论网络环境下舆论的建构,认为对网络舆论的解读需要将其置于现实社会空间,从议题集中、信息整合的表层呈现到内在驱动的态度指向和情绪表达渐次展开。网络既是社会的减压阀,也是现代社会人与人关系的重要缔造者。网络舆论发生、发展的过程,实际上是对现存传播权力和社会关系的冲击和重构,其建构的过程也是虚拟空间向现实生活融合的过程。

有学者的研究揭示了网络舆论萌芽、生成和式微的特征和规律。网络舆论在萌芽阶段大多具有

自发、分散和多源的特点,此时网络言论非理性因素突出,网络话题能促动社会情绪并引发持续增量的关注,呈现出社会风险程度与舆论产出率成正比、各种形态媒介间的交叉传播、容易产生舆论共振效应等规律。网络舆论生成阶段,较之萌芽期更为复杂。一是舆论伴随着事件不断发酵;二是事件本身的发展变动有可能对舆论产生持续的影响,意见领袖出现并影响网络舆论走向,出现舆论“倒逼”和一边倒等现象。进入网络舆论式微期,网络舆论可能因为事件本身得到定论而消退,也可能因为无定论而其他事件使公众兴趣发生转移,网民意见由分流趋于聚合,社会影响向主流化发展。

有学者研究了网络舆论形成过程受到网民群体结构特征和行为表现的影响。在新媒体融合环境下,网络群体成为影响主流舆论生成与发展的显性力量之一,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网络群体从个体和政府两个层面对舆论生成的范围和可能进行干预;二是话语权合法化的博弈成为影响舆论生成的关键;三是关系连接“多元化”影响舆论生成的源泉;四是符号的暴力影响舆论生成的话语展示;最后是舆论生成的实质体现权力的延伸。

舆论监督研究。根据2014年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5年对舆论监督的研究有所加强,学者们在宪法权威和依法治国的框架下,对舆论监督法律体系的构建、舆论监督权的法理逻辑,以及媒体舆论监督的制约和管理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针对网络媒体的发展和对传统媒体舆论监督功能的挑战,学者们还深入讨论了网络媒体监督功能的实施及对策等问题。

有学者针对当下舆论监督无法可依的被动局面,主张构建舆论监督法律体系,主张从检查和纠正违背宪法规定的言论与政策入手。构建舆论监督法律体系要在更新新闻理念上下功夫,主张从以下三个重点入手:一要牢固树立当好社会哨兵的观念;二要对公众人物的隐私权和名誉权给予一定的约制,三要实行公众、传媒和公权三者利益的平衡。

有学者认为舆论监督权是中国语境中特有的概念,但从宪法条文的语义上看,舆论监督权的享有主体、对象和运行机制存在着法理上的悖论。他立足于中国宪法文本的整体结构,运用目的解释方法澄清相关宪法条文的立法目的,从而还原了舆论监督权在中国宪法语境中的真实含义,并用商谈理论重构了它的法理基础,将其规范性含义确认为中国“协商型治权”,以消除舆论监督权的法理悖论,使之实现学理上的逻辑自洽。

网络舆论监督是舆论监督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学者指出,网络舆论监督作用的发挥,往往伴随着众多失范行为。这种失范行为的成因,既有社会规范系统缺位,也有个体认知误区与心理的失范,同时也有技术方面的原因,即网络媒体把关人的缺失,以及网络传播的转发和评论功能的滥用。因此,探索网络舆论监督失范行为的化解途径十分必要。这位学者提出用“互联网思维”实施一系列有效应对之策:从社会层入手以法治理念规范网络舆论监督,从管理层出发建立规制疏通出口,从网民层入手同步提升法律意识和媒介素养,实行网络舆论监督的预期目标。

舆论引导研究。在媒体融合背景下,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如何顺势而为?有学者提出,要在“先进技术为支撑,内容建设为根本”的指导思想下,走四条路:构建传媒智库,将行业专家塑造为舆论领袖;加强内容建设,通过议题设置引导社会舆论;把握好时、度、效,抢占热点事件的舆论先机;探索民生议题的讨论空间,保证舆论表达健康顺畅。

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兴媒体,深刻改变着舆论格局和舆论生态,给党报主流舆论影响力带来严峻

挑战。针对这些情况,有学者指出,当下做好党报工作,把握舆论导向是关键。党报目前正面临“洪水泛滥、随波逐流、泥沙俱下”三大挑战。“开源、清流、引导、灌输”是应对挑战的四条基本路径,即拓展互联网思维,增强党报优势;抓住传播时机,排除杂质干扰;把握党性民意的共振点,因势利导;增强针对性,提高新闻内容质量。

在广播电视方面,有学者结合中国媒介融合和广播电视舆论引导的现状,借鉴国外经验,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维度提出如下策略。从宏观层面完善广播电视政策规制,推进广播电视产业化以及实施全媒体战略。从中观层面完善区域传播和整合,拓展新媒体联动渠道和提高受众媒介素养。从微观层面发展广播电视融合新闻和数据新闻节目,改进传播技巧,培养媒介融合环境下的广播电视人才。

还有学者以2015年某些舆情热点为案例,分析媒介融合给舆论引导带来的积极效应,即缩短了舆论引导的进程,凸显公共舆论价值;接力公共议题讨论,激发社会人文关怀;构建舆论讨论平台,促进普法教育深入。同时,舆情信息的碎片化、娱乐化和商品化也对新闻真实性、正面传播效果和媒介公信力造成损害,给舆论引导带来潜在的负面影响。

2015年学者们还对舆论引导方法及策略、舆论场、突发公共事件与舆论危机、舆情特征与管理、谣言传播及治理等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和深入的研究。

二、2015年新闻传播学术会议

2015年是新闻传播学术会议召开密集度较高的一年,本年度全国各校召开了一系列多层次、广维度、高水准的会议。

1月9日,由中国传媒大学媒体法规政策研究中心、文法学部、广播电视研究中心和文法学部政法学院共同主办的“媒介融合时代的国际传媒政策与法律”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主题为“新时代·新问题·新挑战”,共分四个单元:“国际视野·媒介融合·焦点问题”“国际视野的文化政策、版权、个人信息保护”“各国传媒侵权与伦理问题”和“各国传媒政策与法制”。与会者深入探讨了媒介融合带给传媒监管的种种机遇与挑战。

1月24日,由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电视学院主办的“第二届新闻·出版类期刊主编圆桌论坛”在北京举行。《国际新闻界》《新闻与传播研究》等全国20家新闻出版类期刊的主编、主任围绕“2014年学术热点及2015年学术展望”论坛主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3月25日至30日,由中国传媒大学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所联合华东师范大学—康奈尔比较人文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缙云国情调研基地和缙云县河阳乡村研究院共同主办的“乡村、文化与传播学术周”在浙江缙云举行。为期五天的学术周由“缙云县河阳村民间非遗文化节”、首届“河阳论坛”与“2015批判传播学年会”等构成。2015批判传播学年会以“乡村、文化与传播”为主题,与会者分享了对城乡关系下的传播议题的思考与分析。

4月10日,由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与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电视学院联合主办的“第四届中国时政报道研讨会”在北京举办。与会者结合当年的“两会”报道,就“多元语态下时政报道新特征”这一主题探讨了中国时政报道的改革和创新。

4月24日,由重庆大学新闻学院在重庆主办的“中国媒介法治与新闻伦理规范高端论坛”在重庆召开。与会者就传播法研究的对象、新闻立法的条件、媒体法治对竞争的影响、新闻伦理有关的理论和实践等进行了讨论。

4月24日至25日,由中国新闻史学会主办、湖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承办的“中国新闻史学会常务理事会2015年会暨200年来新闻事业研讨会”在武汉召开。会议围绕“移植与突破:中国近代新闻史研究借鉴与发展”“借鉴与发展:中国现代新闻传播研究建构与改革”“建构与改革:中国新闻传播理论与实践发展研究”等议题进行分组讨论。

4月26日,由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甘惜分新闻思想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在甘惜分先生百岁寿辰之际,国内新闻传播学界知名专家学者共叙甘惜分先生在教坛耕耘六十年的学者风范,向甘惜分先生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作出的奠基性贡献致敬。

5月9日,由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主办、中国传媒经济与管理学会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合办的“第六届传媒发展论坛暨《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2015)》发布会”在北京举行。论坛的主题为“媒介融合与网络空间新秩序”,与会者就新形势下媒介融合发展、中国在建构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事业中的角色、地位与作用等问题展开研讨。

5月16日至17日,由中国新闻史学会网络传播史研究委员会主办、重庆大学新闻学院承办的“2015中国新媒体传播学年会”在重庆举办。本次年会以“新媒体,新格局,新视野”为主题,与会者围绕“新媒体发展与传播学科创新”“传统媒体的转型与媒介融合”“社交媒体与媒介素养”“新媒体与网络文化”“新媒体与策略传播”“新媒体舆论与公众参与”“新媒体平台发展”“新媒体话语”“新媒体与国家治理”“新媒体与议程设置”等议题展开了研讨。

5月17日,中国传媒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主办的“第二届中国传媒经济博士论坛暨第五届‘五四’青年学术交流会”在北京举行。论坛主题为“传媒新经济——融合与跨越”,从宏观角度入手,讨论传媒经济的创新、融合和发展。

5月22日,由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主办的“2015清华财经新闻论坛”在北京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为“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报道”,论坛分设四个议题:解读“新常态”、报道“新常态”、图绘“新常态”与数说“新常态”。与会的中外媒体与教育研究机构的专家,从经济新闻的国内报道、国际传播以及国外报道等视角,结合媒介融合与数据新闻的发展来探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

5月30日至31日,由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和社会思想研究所主办的“文化记忆:时代、历史与媒介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杭州举行。会议围绕“国家与民间:文化记忆的多重话语空间”“文化记忆理论与美学”“战争书写与文化记忆”“文化记忆的历史维度”“文化记忆:纪实与虚构”“阶级想象与记忆实践”“文化创伤与历史叙事”等议题展开了跨学科的对话。

6月6日,由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主办的“变革与坚守——新媒体环境下新闻实务及其教学的改革与思考”学术论坛在北京举行。会议以“新媒体环境下新闻实务发展及其教学变革”为主题,共同探讨新媒体时代的新闻业务和教育变革。

6月11日至12日,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办的“第四届全国对外传播理论研讨会”在重庆举行,主题是“构建融通中外的对外话语体系”。重庆大学新闻学院承办了“城市形象与国家品牌传播”分

论坛,与会学者、业界领导、宣传部门负责人从不同角度研讨了城市形象与国家品牌传播。

6月12日至13日,由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传播研究院非洲传媒研究中心主办的“中非传媒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媒介发展、跨文化传播与公共外交”,共分五个分议题,分别为“中非媒体发展”“媒体报道中的中国与非洲”“中非软实力建设与公共外交研究”“中非电信发展与合作”“中非跨文化传播”。来自中国、南非、加纳、莫桑比克、美国、德国、挪威等14个国家的50多位中非传媒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及业界专业人士等参会。

6月13日,由中国传媒大学文科科研处、国际传媒教育学院和中美教育基金会(US-China Education Trust)联合举办的“2015国际传媒教育论坛:中美传媒教育研讨会”在北京举办。与会者围绕“媒体与中美关系”这一主题,以习近平主席九月美国国事访问为背景,从媒介的角度出发,探讨了美国外交政策、中美峰会的重要意义、美国政治与媒体的关系,并且涉及美国传媒发展的新动向、中美对外传播与公共外交的策略比较、美国媒体报道中的中国国家形象个案研究等中美政治传播领域的热点议题。

6月13日至14日,由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联合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传播艺术系和宾夕法尼亚大学安娜伯格传播学院共同举办的“2015传播与公共性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杭州举办。主题为“社交媒体与公共参与”,与会者深入探讨了媒介、传播与公众研究中的前沿理论与研究方法。

6月15日至16日,由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新闻学院与美国普利策中心联合主办的“生态文明与环境报道国际会议”在耶鲁北京中心举行。70余名来自中国、美国和加拿大的学者、环境学家和政府官员就“生态文明”与“环境报道”两大主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6月27日,由中国新闻史学会新闻传播教育史研究委员会主办的“中国新闻教育的历史与未来学术研讨会”在重庆举行。与会者就全媒体时代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中国大陆新闻院系教育改革探索、中国新闻教育学家的教育思想与实践、国外新闻教育改革的经验等展开了讨论。

6月27日至28日,由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美国太平洋大学传播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央广网、中国社科院世界传播研究中心、中国网络传播学会等机构联合主办的“大数据与全球传播变革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河北举行。研讨会下设大数据产业与技术论坛、大数据时代的新媒体论坛、媒介融合创意论坛、数据新闻论坛四个分论坛。

7月3日至4日,由上海《学术月刊》杂志社、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辽宁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联合主办的“第三届传播视野下的中国研究论坛(2015)暨传播变革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在辽宁沈阳召开。围绕着“传播变革与近代中国”的总论题,与会者从传播技术变革与社会秩序及其人群交往与交流关系来探讨中国晚近以来的社会和文化变迁。

7月4日至5日,由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等联合主办的“第一届文化与传播符号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成都举行。本次会议的主题是“新媒体时代的文化与传播符号学”,与会者全面讨论了传媒时代文化与传播符号学的相关议题。

7月4日,由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新挑战、新机遇、新常态:传媒产业发展与研究论坛”在北京举行。与会者就“媒介融合时代传媒生产创新”“新闻传播关系中的传媒消费”“传媒市场竞争与多样化”“新媒介生态环境下政府对传媒业的规制”等议题等展开了研讨。